

•红河彝学文丛•

彝学

YIXUE YANJIU WENJI

研究文集

戈隆阿弘 著

红河州彝学学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红河彝学文丛·

彝学

YIXUE YANJIU WENJI

研究文集

戈隆阿弘 著

红河州彝学学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学研究文集 / 戈隆阿弘著. -- 昆明 :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67-6746-1

I. ①彝… II. ①戈… III. ①彝族-民族学-文集
IV. ①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6599 号

彝学研究文集

戈隆阿弘 著

责任编辑	张海英
特邀校对	张秀芬 张京宁
封面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省个旧市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6746-1 / K·1766

《红河彝学文丛》编委会

顾问：白保兴 陈霖 李涛 普绍忠 李成武
普菊红 王忠

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松万明

副主任委员：师有福 范元昌 李才学 佟金兰 杜国富

委员：陈能 李建阳 钊辉 张学理 段颖 李正有
余嘉发 何劲松 李跃生 张俊伟 祈金华 张文
岳玉宗 施海斌 刘宝寿 尹武 邹荣华 孔凡学
李嫚翎 毕贵宏 周踊 李自恒 刘耀 李堂兴

编辑委员会

主编：师有福

副主编：张辉 赵静 普梅笑 满丽萍 龙保贵 陆忠民
李朝春

编委：李芸 李绍辉 普梅丽 李西索 段和平 段勇
汪致敏 高文 李金发 杨永明 孔令凯

《红河彝学文丛》总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普绍忠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因红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境而得名。红河州的地理构造奇特，区位优势明显，东接文山州，西连思茅市，北临省会昆明市，南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848公里。境内最高海拔是金平县西隆山，有3074.3米；最低海拔在河口县的红河水与南溪河汇合处，只有76.4米。红河是云南人文资源的缩影，是云南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和向南亚社会经济文化辐射的国门口。

红河州是一个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疆自治州，全州国土面积3.293万平方公里，辖4市9县，有11个世居民族。据2014年统计，全州总人口455万，少数民族人口275万，占总人口的60%。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6个，其中彝族112万、哈尼族85.6万、苗族33.8万、傣族11.7万、壮族11.4万、瑶族10.1万。

—

红河州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是云南开发、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享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滇南商埠”等美誉。在这南盘江、红河和藤条江三江穿越，异龙湖、大屯海和长桥海三湖点缀，哀牢山、无量山、乌蒙山南部三山交会的神秘地方，有15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有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马鹿洞“蒙自人”，有4000年前的燕子洞新石器人类活动遗迹，有3000年前的彝族先民祭岩神图和狩猎崖画。淳朴浓郁的各民族民风民情，异彩纷呈；不同的各民族服饰，绚丽多姿；折射出各民族天文历法和哲学宇宙观的节日文化，丰富多彩。

红河彝族地区自汉朝时候开始设置郡县。唐宋时，彝族先民崛起于巍宝山麓，建立南诏国。这一时期，红河彝族先民的地方政权有阿庐部、弥勒部、阿迷部、纳楼部、阿欲部等。至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治理地方，向皇朝纳粮上贡，保境安民。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开始，红河彝族地区由于人口众多，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仍有较大差异。红河彝族土司制度，延至民国时期，由于受龙济光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牵连，建水纳楼土司被取消世袭权利，标志着土司制度在红河彝区的终结。

彝族人民具有与时俱进的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红河这块土地上，彝族人民团结其他民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唐宋时期，彝族先

民彝判联络南蛮三十七部，协助段思平消灭篡权乱国的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明正德年间，十八寨彝族首领阿寺、阿务率领彝族人民反抗明朝暴政，威震滇省。清咸丰年间，红河彝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为了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响应杜文秀和李文学的起义，在全州范围内举起了反抗清政府的义旗，开远、建水两地的斗争尤为惨烈。其中开远城曾被彝回联军和官军分别争夺占领，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泸江河，城郭数次变为焦土。

清光绪年间，中法战争在越南战场爆发。1883年，弥勒博士弟子副员武举范世昌率乡勇随滇督岑毓英入越抗法，战功显赫。而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法方订立了丧权辱国条约，法国殖民者变成了越南的宗主。法国占领越南后，迫使清政府同意其修建滇越铁路。滇越铁路修通后，个旧的锡、开远的煤，以及其他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山河破碎，家国飘摇，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彝族人民把本民族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维护着祖国西南边疆的主权利益。在反抗殖民者的掠夺和剥削中，留下了一个个气贯长虹的历史故事：杨自元火烧洋关、参与个旧矿工起义，纳楼土司普国泰派兵在嘉禾街击退法国入侵者，这些都是清末民国年间红河的历史大事件。

民国初年，列强掠夺，袁世凯篡国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日寇入侵，建立伪满政权。国土几经分崩离析，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8年4月，红河彝族人民在张冲将军的带领下，奔赴抗日前线，血战台儿庄，坚守禹王山。六十军一八四师者朝臣营长和上校团长泸西白水彝族何起龙等，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20世纪40年代，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险阻，创立了西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边纵部队，对云南的解放以及追歼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彝族为主、彝苗汉杂居的蒙自查尼皮，就是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遗址。当时，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片神奇的地方，与国民党残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迎来了人民解放的曙光。

二

彝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和谐做出了特殊贡献。彝族先民在秦汉时期建立了古夜郎国、古滇国，唐宋时期又建立了南诏国。3000年前古蜀国留下的“三星堆”文化，仍然能够看得见彝族文明的风采遗迹。

彝族人民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以阴阳结构为主体的彝族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彝族先民用这套文字记载了本民族的历史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史。彝族文化博大精深，从自然界生态运动盛衰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彝族哲学思想认为，公母是万物之本，雌雄二性合化是万物之源。以阴阳观念为基础，通过观测太阳影子移动总结出太阳的运动规律，创制出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十月太阳历”。“十月太阳历”一年分阴阳两截，上半年阳年祭太阳神，下半年阴年祭祖，一

年约为365天。文字方面,据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彝文抄本《文字起源》记载,独体字彝文是由女氏族首领苏撒审玉嫫发明、男氏族首领进一步完善,它具有阴阳结构特点,是世界上六种古老文字之一。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共同组成“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根据《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试行体系》,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连续三次召开了“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

2009年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的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帕文相并列,而且可以代表世界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并得出“彝族文字的总分值排名第一”的结论。课题组对古彝文研究评鉴系统,主要从古彝文字的生命力——“长度”、影响力——“宽度”、文化力——“厚度”、传承力——“活度”、稳定力——“定度”、价值力——“值度”六个维度进行科学评鉴。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 000年以上时间的学术观点在学界比较认可,原始古彝文字的创制使用时间大致可以推算为7000—10 000年或以上。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彝文是从实物记事—图像符号—刻画符号—表意字符中走过来的,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表意表音相结合的独体文字系统。彝族先民用这套文字记录了举世瞩目的十月历法、阴阳雌雄观等等,彝文古籍浩如烟海,内容博大精深。

清朝时期,红河州的彝族文字是官方使用的文字之一。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云南抚都院用彝汉文左右上下书写对应的形式下发特示,以靖边陲。乾隆至道光年间,临安府每年定时举行毕摩会考制度,合格者赠与盖有满汉文府印的经书,政府按年发饷,协助维持地方事务。1982年7月,红河州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救书、救人、救学科”的指示,成立“红河州彝族文化研究筹备组”,并在个旧市州文工团一楼办公,抽调人员开始收集抢救彝族古籍。1983年,彝族干部和毕摩座谈会在红河州民族干部学校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联名向全国人大写信要求成立“红河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后来批转州革委。1984年年初,正式成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语文古籍研究所”,红河彝族古籍抢救工作步入正轨,为红河彝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

当今世界,文化不断凸显成地域、民族和国家竞争力与发展空间的潜在后劲和巨大实力。文化繁荣,经济社会就会呈现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反之,文化底气不足,文化发展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就会出现畸形失衡状态。

文化力就是生产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是否具有魅力和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是看它能否用文化力整合各种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只有发展文化生产力,经济发展才能获得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才能赢得主动权。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知识、智慧、价值观念、人文环境、精神动力,最终将转化为物质经济的竞争力,地区和城市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

力的较量。文化资本就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由固有静态资源和与时俱进的动态资源构成，它是一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实质上是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价值的实现过程。文化资源一旦实现人类共享、形成新的发展基础以后，就成了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经济资源。谁占有了优秀先进的文化资源，谁就掌握了新一轮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文化旅游产业是和谐社会经济产业。科学不分国界，优秀文化超越时空和民族。网络信息全球化的到来，使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和原生态文化的生存问题，文化生态平衡和谐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之一。

民族的区别就在于文化的不同，民族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所有人类文化，都是以民族文化形式存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思想、感情、精神的突出表现，文化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世界性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某个民族性的基础上的，是以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阶梯。分布在滇、川、黔、桂、渝的900多万彝族，历史上为中国西南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保存了许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彝文与甲骨文、彝族十月太阳历与十天干、伏羲女娲与彝族兄妹洪水婚姻传人种等文化信息，透视出了彝族先民的文化智慧。中国彝族文化是西南各民族文化资源中最具发展优势、发展潜力、发展活力的资源，研究好、利用好，将促进西南边疆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

红河州彝学学会自1989年8月成立以来，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先后单独出版或参与主持研究出版了《彝族古代史研究》《彝苗象形医学》《红河彝族辞典》《红河彝族文化史》《彝族文化论》《话说红河·彝风古韵》等130多部书，参与完成出版了《中国彝族通史》《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106卷)》《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1—20卷)》《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等重大科研项目。红河州彝学学会共有11个集体会员，会员总数达3000多人。市县彝学学会办有《南滇彝族》《弥勒彝学》等刊物，不定期出版研究文集、专著、古籍译著等彝学作品。

红河彝学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目前为止，完成了两项国家级课题、六项省部级课题、两项州级课题，有八项彝学成果获省部级奖励，五项成果获州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其中，96万字、堪称“红河彝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红河彝族辞典》，2004年获云南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红河州首部社科成果获省政府奖励的作品；《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于2011年获云南省第十五届社科成果优秀奖；18 000行的口传文化史诗巨著《爱佐与爱莎》，2012年3月获云南省第六届文艺创作基金奖，同年5月获云南省第七届文化精品工程优秀奖，2013年获第十三届省政府优秀出版物奖；红河州彝学学会参与的重大课题《滇川黔桂彝文字集》，2007年获中国政府图书出版奖提名奖；《滇川黔桂彝文字典》，2005年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图书二等奖；《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丛书》，2013年获中国政府图书出版奖提名奖。2011年完成8000多字的滇南彝文软件字库开发项目，实现了用电脑打印滇南古彝文和全国规范彝文的目的。红河州彝学学会成立至今，学会和学会成员出版的彝学作品达130多部，包括研究专著、文集、古籍翻译、工具书等等，内容涉及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学、医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等学科。

四

2012年12月7—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红河州彝文化研究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汲取中华文化精华，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着力提升彝文化遗产抢救能力和学术原创能力，融入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战略，积极主动参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红河州的重大发展战略部署，为推动红河州率先实现跨越发展，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红河州是全国地州市级彝族第二大聚居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彝文典籍类型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彝族文化不仅仅是彝族人们的精神家园，也是彝族与各民族联系的感情纽带。因此，对红河彝族文化的整理研究是丰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程，也是增强广大彝族同胞对国家认同的重要过程，更是为丰富红河文化、加快自治州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对这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文化惠民大工程，我们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把它做好。

为了加强民族文化强州建设，提升红河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加快和提高红河州的历史文化地位，红河州彝学学会于2012年启动研究出版《红河彝学文丛》系列丛书。2012—2014年，共出版了12部，计划到2019年国庆70周年之际出版50部。丛书以抢救传统文化、社会历史文化调查、专题研究著作、古籍翻译、研究文集、综合研究著作、比较研究著作为主，借鉴国家社科课题管理模式，吸收最新的彝学研究成果，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执行编纂、编辑工作和审定程序，使之达到文化精品力作的要求。

我相信，在州委、州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红河彝学文丛》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对丰富红河文化正能量、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2015年8月18日于蒙自

追寻古夷人的足迹（代序）

——彝族学者戈隆阿弘传奇

樊 凡

在我认识的人中，戈隆阿弘是个少有的非同寻常的人。他没读过几年书，却成了中华民族知名作家；他不懂史学、民族文化学为何物，最终却成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百科知名专家”。而今，他已退休十年，仍被州文化局请去编《红河文化》，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采访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在我们是老交情，互相交往之中，我有意识地积累了他的一些资料。抽时间，几易其稿，才有了这篇小文。

戈隆阿弘，彝族，汉名施友万。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人，1934年10月17日生在龙朋镇桃园村。1951年参军，1982年转业，在部队工作长达31年。今已是年越古稀之人，但在文学创作和彝学研究上，仍然很勤奋，他的座右铭是“从勤奋中挖掘自己的天才”。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和研究中，他共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有3部文学作品，2部彝族民间歌谣集，3部彝学专著。曾荣获3个国际金奖，3个国际优秀论文奖；在国内，获1个金奖，3个特等奖，5个一等奖。有两篇论文被收入《世界优秀论文文库》和《国际优秀新学术成果精选》。在国内，有6篇论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建国55周年优秀获奖论文文库》《中国当代思想经典》等多部国家级大型文献。被中华全国理论创新研究会授予“中国二十一世纪百科知名专家”称号，被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作家创作成果报告编委会等三家机构提名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知名作家”。他的生平，平凡之中，颇带几分传奇色彩。

这里记述的，主要是他从事彝学研究的故事。

一不留神，闯进史学殿堂

戈隆阿弘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孩提时代，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围坐在火塘边听大人讲民间故事。稍大一点，喜欢感情热烈奔放、优美动听的民间歌谣。他的心里，装着许多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正因为喜欢民间故事和歌谣，参军到部队，特别是部队平定了匪乱进入城市后，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图书馆、书店为喜爱故事、歌谣的他提供了许许多多新鲜而有趣的读物。他特喜爱小说与诗歌。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从爱读到爱写，1960年前后发表了处女作，由此走上了业余文艺创作之路，自学成才，奋力拼搏，最终成为一个作家。

戈隆阿弘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进行文学创作。作为一个彝族子孙，他很希望写出更多的反映彝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作品。出生在彝山，十多年受传统文化熏陶，对于现实，他有不少感受，谈到彝族的历史，他知之甚少。他很希望有一本彝族史，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汉族有《中国通史》，许多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民族史，唯独彝族，却一直都没有一本自己民族的民族史。在彝族的族源历史上，就有各种说法。有“东来说”，亦即楚人后裔说；有“西来说”（也称“外来说”），彝人的典型特征是高鼻深目，与西方的雅利安人有些相像，有学者就断定彝人是外来人种；有“南来说”，意思是来自印支半岛的马来人种；有“土著说”，也就是说彝人在云贵高原土生土长；最多的是“北来说”，亦即氏羌后裔说，意思是战国时秦献公兵临渭首，征伐羌人，被驱赶的羌人南迁跑到云南来的一些人的后裔。时至今日，报刊、书籍、媒体，凡介绍彝族（包括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许多民族）的文章中，谈到族源，都少不了要加上一句“氏羌后裔”，或曰“氏羌系”。意思是说，彝族的先民，是远古时从西北青藏高原南迁的氏羌人演变而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朝史家司马迁就认定的。和一切文化人一样，戈隆阿弘是个遇到事情爱追根问底的人。特别是彝族的族源，他总是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彝人的子孙，对自己的祖先一问三不知，那是最可悲的事情。

彝族真的是从西北青藏高原南迁的氏羌后裔吗？戈隆阿弘找来了许多有关史料来看，其中，有汉文史料、彝文史料，有考古发掘出的地下出土文物史料，比如《汉书·西羌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羌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等，将彝、羌历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他发现，彝族和羌族，确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如“崇虎”“父子连名”“火葬”“党母族”等。此外，原始宗教观念、历法、祭祀、婚丧习俗、民间文学、服饰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说明，两个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彝源于羌？还是羌源于彝呢，查看历史，彝族以“十月历”和“刻划文字”为标志，其历史可追溯长达万年以上。羌族历史上无文字，从口传史诗《别格钮〈羌戈大战〉》等传说中追溯历史，至今不过三千年。羌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天上来的，是“仙女木吉卓，下凡人间，繁衍出羌人”。虽然名字不同，但这个“仙女木吉卓”下凡的故事，与滇南彝族创世史诗《尼苏夺节》中讲到的天神策格兹嫁女给人间彝人始祖独母儿子达方的情节如出一辙。据国家民委主编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载，羌族“以十月为岁首”。羌族有三个重要的庙会，第一个庙会“川主庙会”，时间固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与彝族的火把节同一天过。以十月为岁首，六月二十四节，都是彝族十月太阳历的重要节日，说明万年前的古夷十月太阳历，也曾经在羌人中流行。说彝族是氏羌后裔，让人难以理解。要说羌人源于彝族先民古夷人，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羌人源于彝族先民古夷人，这样，彝羌之间，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这很合乎逻辑，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祖宗的后裔，虽然分支的年代久远了，异地发展的结果，固有的传统文化不免会产生变异，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创造，但文化是有传承性的，从远古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仍然会有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习俗。

彝族“氏羌后裔说”的依据有二：

其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君长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

中原汉人创造的名词。许慎的《说文解字》云：“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那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羊儿，即羊羔子，是民族歧视的一种表现。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有许多被中原汉人称做“羌”的部落群体，属于彝族先民古夷部族。三国时，中原汉人把云南夷人统统称做是“羌人”，因此，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有“移劲卒青羌万户于蜀”之说。实际上，夷就是夷，羌就是羌，不可混为一谈的。可惜，这些在民族分野上的概念，至今许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因而，在彝语支民族的族源上，仍要归于“羌”之类。这是极其错误的。

上下求索，几个意外的发现

那么，彝族源于何方呢？这是一个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探索像彝族这样一个具有万年前的文化遗存的民族的族源，仅仅从其周围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从文化血缘上的联系上去探索，显然是不够的。即便从文化血缘联系探索，也要看谁的文化是最久远的。事实上，只有历史久远的民族文化才可能是一切相同相似文化的源头，而不是相反。这该说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古彝文、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可以追溯长达万年历史，应该肯定地说，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历史，起码也有万年，甚至更长，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发展历史最长的民族。这一点，无人能提出异议。探索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族源，不能不追溯一下人类的起源。我们知道，云南高原金沙江两岸，是世界古人类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今发现的世界最早学会用火的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出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楚雄州的元谋县。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恰恰就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这，绝非偶然。

戈隆阿弘并非着意去研究历史，只想把自己民族的族源搞清楚。可事实上，他一无所获，懵懵懂懂地就闯进了神圣的史学殿堂。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古往今来，英才辈出，有许多著作等身、享誉中外的大学术权威，他们都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人所共知，一代传一代，被人广为传诵，约定俗成，是轻易动摇不了的。戈隆阿弘算什么？既不是科班出身，又无更多的学术造诣，只凭一股子热情去探求，能探求出什么来？像俗话说说的，不过是“闲聊无事，小整整罢了”。谁料，就是这个戈隆阿弘，凭着他彝家汉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惊人毅力和执着，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建树。

首先，在他仔细审视和研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即古人类的生存年代，从南到北，呈现南高北低的阶梯形。如：

开远小龙潭的腊玛古猿化石，距今1500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距今800万年。

金沙江边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距今400万年。

元谋蝴蝶岭的“东方人”化石，距今250万年。

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

往北到陕西的“蓝田人”化石，距今110万年。

再到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距今40—50万年。

这个猿人化石的阶梯形，意味着什么？难道是偶然的吗？或者，它向我们喻示了什么远古的信息？这些问题，引起了戈隆阿弘的深深思考。但百思而不得其解。时值1984年，戈隆阿弘有个偶然的机会，在石屏听了云南省博物馆下来考查恐龙化石的研究员张兴永先生的一次考古课，讲到地质学时说：中国境内，两亿多三亿年前，唯一一块大陆是康滇古陆。其范围，北到西康，南到红河州的石屏县，是古生物衍化的重要地区。几句话，给了苦苦思索古猿化石呈阶梯形成因的戈隆阿弘一个极大启发。他想，该去读一下地质学，这样，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于是，他千方百计找朋友要来了一本地质学方面的书并如饥似渴读了起来，这一读，果然收获不小，让他明白了，在3亿多年前，中国地域的大部分，属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洋的边缘浅海。1.2亿年前，出现了“燕山运动”，随着燕山山脉的崛起，在现今的中国北部版图内，托升出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岛屿。但许多地域仍然是汪洋一片。后来在6000万年前，地处当今印度洋海域的古冈瓦纳大陆，随着地质运动一分为三，即一块向南漂移，成了而今的澳洲大陆；一块向西北漂移，成了非洲大陆；一块（今印度大陆）向北漂移，与欧洲板块相碰撞，挤没了特提斯洋的边缘浅海，顶出了一个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才最终形成了现今的中国版图。在“元谋人”生活的170万年前，黄河还未形成，长江还在往西流入印度洋。后来，地质变化，形成了三峡峡谷，长江才向东流入东海。160万年前，黄河形成。由于两条大河的冲积作用，逐渐形成华北、华中、江南等平原，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地质环境，为中国境内人类的迁徙与繁衍奠定基础。而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大多数古人类化石，年代久远的，大多出在原康滇古陆范围内。说明康滇古陆地处地球赤道附近，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各种动植物生长都十分茂盛，是古人类演化的理想之地。由此可知，开远腊玛古猿、禄丰古猿、猿人岔科、东方人、元谋人，这众多年代久远的古猿人集中出现在云南高原，绝非偶然，是地质与气候史上合乎情理的创造。在众多古人类中，学会用火的元谋人，最具生存竞争的优势。实际也如此。元谋人以火作为生存竞争的有力武器，在种族不断繁衍之后，通过觅食，不断从云南高原出发，向四方迁徙，其种群散布到了整个亚洲地区。前面提到的古猿人化石从南到北的阶梯形，实际就是古猿人通过觅食从南向北迁徙时所留下的痕迹。这也就是“南猿北迁”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弄清了这个问题，其他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我们说，云南是黄种人类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原始摇篮。

史学界有种说法，“人类起源于非洲南猿，‘露西’是人类共同的祖先。”戈隆阿弘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说：“外国猴子会变人，难道中国的猴子就不会变人？哪有这样的道理。”他相信，人类起源是多元的。那种以遗传基因相同为由，将中国的黄种人来源归于非洲的说法，无异于科幻小说。谁又对中国的“元谋人”作过基因检测，证明中国的黄种人不是“元谋人”后裔呢？

戈隆阿弘的另外一个发现，那就是他第一次发现了在远古时期，从西南到中原的广大地区，曾生活着一个以“夷”作自称的部落族群。夷，古音读作“尼”，最先出自“东夷”，是炎帝的分支。《史记·正义》载：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濮阳），又徙鲁（今山东）。”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濮阳的西水坡考古发掘出用贝壳摆塑的虎龙墓，当是炎帝时代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边，左边摆虎，右边摆龙，形象栩栩如生。墓主人的身

份无法确认，但从葬式的特殊可见，非一般人，极可能是炎部落的一代王者，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一代炎帝。炎帝在濮阳祭祖分支，向东迁入山东者，发展成“九夷”，也称“东夷”。此“夷”，不是他称，而是自称。无独有偶，世代生息于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也自称“夷（尼）”。如“尼苏”，北部方言是“诺苏”，贵州毕节的东部方言谓“糯苏”。尼、诺、糯，因方言有异，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指“黑”或“黑色”，是古夷（尼）人黑色崇拜的遗留。联系到古夷人从云贵及巴蜀地区往北往东迁徙的历史，5000年前，山东、苏北一带的“九夷”与云贵川的古夷人，当属同一族群。彝文古籍《彝族源流》中就有彝族先民古夷人分支多次向北方迁徙的记载。这一点，山东大汶口、丁公村地下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符用古彝文作出了破译，就可证明。还有一例，我们知道，东夷有一则《后羿射日》神话，说当初，天上出了九个太阳，晒得大地赤日炎炎，庄稼枯萎，颗粒无收，首领后羿为解民于难，用弓箭射掉了八个太阳，使世界变得风调雨顺。此神话的摩岩画，却在滇南弥勒县五山金子洞坡彝区被发现。彝族神话《支格阿鲁射日月》，也与后羿射日神话如出一辙。可见，西南彝族先民与山东“九夷”有血缘文化的联系，并非妄言。

正当戈隆阿弘苦苦追寻古夷人足迹，欲穷究彝族人起源、繁衍、分支及其迁徙之谜时，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刘尧汉教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的虎宇宙观》，以他在大小凉山发现的彝族以十二生肖轮回纪日，每年十个月，每月36天，外加5天过年日，年总天数为365天的“十月太阳历”的文化内涵，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破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千古之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他没找到“十月太阳历”的彝文文本。后来，80年代初，“十月历”文本，被师有福等人在滇南红河州弥勒县五山彝区老毕摩杨家福的世传经书中找到。该历法与刘尧汉教授发现的“十月太阳历”有些不同，它用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鹿、岩羊、猿、豹、四脚蛇十兽轮回纪日，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十月兽历”。它显得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十二生肖中的动物，半数是人养的，而“十月兽历”中的十兽，没有一种是人养的，说明，它是人类在狩猎活动中认识和熟悉的动物，因此，“十月兽历”，可以断定是彝族先民在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历法。其时间，当在万年前。

按刘尧汉教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考证，“十月历”被伏羲氏带到了中原，成了后来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朝的历法《夏小正》就是在古夷十月历的基础上制定的。《诗经》中无法破解的“一之日”“二之日”等，就是“十月历”十个月360天后安排5天过年日的遗留。

两个古夷（彝）历法的发现，大大扩展了戈隆阿弘的眼界，使他把探寻的触角，深深地深入到彝族先民古夷人所经历的遥远的原始母系社会之中。

这一时期，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有重大突破。1989年，彝族著名作家李乔，将他参观西安半坡遗址时带回来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陶符30多个，借出席红河州彝学会成立大会之机，请与会的彝族老毕摩李八一昆用古彝文帮破译。之前他看到半坡刻符很像彝文，他问过许多彝族学者，也都说像彝文。李八一昆，生活在红河大山上，连汉语都说不出几句，可他当场就读出好几个，后用彝文对照，破译出了二十五个，如盆、碗、碟、彩釉……与半坡陶器相吻合。由此断定，半坡陶符，与彝文有密切联

系。李老很快写出了研究论文，到贵州彝学研讨会上发表，引起了新华社记者关注，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写了报道，在北京《人民日报》上发表。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古文字研究热。很快，国内出土几十年无人能破译的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刻符，7000年前的甘肃大地湾、河南贾湖遗址陶符，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包括《夏禹书》《苍颉书》都被专家学者用古彝文作出破译。这一系列的成果，让戈隆阿弘看了兴奋不已。让他从中看到了古夷（彝）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之间，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据此提出，“彝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是在汉民族血缘漩涡形成的过程中，被排挤出中原的。”自然，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不能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后来，他得到确切资料，昆明呈贡县的金宝山遗址出土了3个陶符，  ，用南部方言的彝文破译，读音是“摩夺织”，为竹， 为集会或聚会。彝人自古崇拜竹，有“竹生人”之说，显然是彝族先民古夷人集会祭祀竹神的遗留物。其年代经炭14测定为距今12 000—10 000年，是国内出土的陶符中年代最久远的，文字发展也最为成熟，与古彝文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一发现，其意义非同小可。它喻示我们，古彝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其发源地就在云南高原。说明彝族先民还在云贵高原生活时，就已有了初创文字，伏羲部落向中原迁徙之时，才从西南带到中原去的。

一个民族，有了历法，有了初创文字、语言、原始宗教、民族习俗等等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早已形成，并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可以算是一个古代的民族群体了。这些古文化，尽管因先民分支四下迁徙，各自发展形成独立的民族，但文化固有的传承性决定了它们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即便是万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找出这些民族远古的血缘联系。

有了十月历和初创的刻划文字向中原传播的史实，戈隆阿弘苦苦追寻的彝族先民古夷人的起源、繁衍、分支迁徙的轨迹，由此也就清晰可辨。

一万多年前，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气候转暖，风调雨顺，大雨滂沱，加之地球南北极冰盖大量溶化，造成世界范围的大洪水泛滥。“洪水神话”就是那次灾难的生动写照。全世界的古老民族中都有流传。彝汉文史籍中就有许多生动的记载。彝族专门描写的“洪水滔天”神话的长诗就达10余部之多，对洪水的成因、危害及影响，都作了生动描述。汉文史籍《益稷》云“洪水滔天”。《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山河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可见那一次的洪水，前所未见，而且是世界性的。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中就有世界性洪水滔天的描写，由此留下“诺亚方舟”的传说。但现今的人们，只是将它当作传说罢了，没人在意。就连学者们都不曾谈到过那场“洪水”带给人类的是怎样一种灾难。事实上，那是无可置疑的一个历史事件。北京《科技报》曾作过介绍，洪水最大时，海平面比原来升高了197米。据媒体报道，连美国的拉不拉多高原，都曾遭洪水洗劫。那场洪水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人类永生难忘。临近海边平原地带的居民，可以说无人幸存。我国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后裔，很可能就在那场浩劫中大都遭到灭顶之灾。

洪水过后，北方平原人烟稀少，这就给繁衍于西部的古夷族群带来了进入中原的历史契机。比如，“人文始祖”伏羲，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生于成纪”（今甘肃

天水)后,进入中原繁衍出炎、黄两个大部落。夏禹,《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譙周的《蜀本纪》云,“禹本汶山(川西)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后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君。他们都是繁衍于西南的被汉文史籍称为“西羌”的古夷人。假如没有那场洪水,假如西部的古夷人进入不了中原,中国的历史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锲而不舍,追寻古夷人的足迹

戈隆阿弘自从有了上述几大发现,他的思想,就像哥白尼发现“日心说”、达尔文发现自然界的物种演变规律似的,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以上述发现做基础,开始了他的有关彝族族源历史的研究。他觉得,彝族先民古夷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是当今许多民族的共同祖先,搞清这个问题,是彝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史前史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常说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文明的历史,比这要长远得多。关键是要把古夷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彻底搞清楚。目前,在中国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只要把古夷人生存发展的历史搞清,许多的“千古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为了追寻古夷人留下的、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淹没的足迹,他孜孜以求,博览群书,广泛搜集资料,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坚持正常工作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中,他的思想整天就围着古夷人转,早早晚晚,除了睡觉,无时无刻都驰骋在远去了千万年的古夷人的世界里,探寻他们的文化内含与特征,探寻他们留下的每一点蛛丝马迹。不是忙于去广泛搜集有关古夷人的一切资料,钻头觅缝地去图书馆、书店翻阅尘封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光碟录像带,着迷于考古资料收集研究,就是埋头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和撰写论文。忘了时间,忘了下班吃饭,忘了是星期几,是经常事。他时常感到自己很渺小,力量太单薄,很希望能有一大帮人来从事这项工作。

历史总是会给有志者以机会。他的机会来了,1989年,红河州计划成立彝学会。戈隆阿弘因在彝学研究上小有名气,州彝学会成立时,被全体与会会员一致推举做会长。他踌躇满志,决心在彝学研究上做一番事业。他觉得既然当了会长,就该全力以赴,他率领几个副会长及全体理事共同努力,使彝学研究工作在全州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前后任了两届会长,不论是队伍发展,还是动员全州的会员开展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激励学会会员认真钻研,刻苦研究,他写了一首歌,作为彝学会会歌,唱道:

千万年高原的风雨,
铸就了我们坚强的脊梁;
千万年民族的传统,
哺育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卡勒勒,卡勒勒,卡勒卡勒,
独慕的子孙,英雄的儿郎,

不要说我们才疏学浅，
不要说我们是山野蛮汉。
民族要振兴，文化要弘扬。
上下齐求索，何谓苦与难？
团结奋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用血和肉，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这是一首作为彝学会会长的戈隆阿弘从心底里唱出的歌，充满了彝学拓荒人的豪情壮志。

他这样要求会员，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论是学会工作，还是学术研究，处处做出榜样。凭据前面叙述的那些新发现做基础，一篇篇的学术论文，不断撰写出来，他提出的目标是：每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出一本学术论文集。任期6年，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目标，出版了6本学术论文集，学会的会员，从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全州13个县市绝大多数县市都建立起了彝学会，会员达800余人，其中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会员达五六十人。彝学会也因此成为全省最活跃、学术成果最多的学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戈隆阿弘处处身先士卒的榜样的感召和悉心指导下，这支新兴的彝学队伍，形成了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积极进取的学术作风，至今，红河彝学会仍是全省彝学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戈隆阿弘在学术研究上，从来是不遗余力。从不曾想过自己年岁大小，直到有一天，馆领导找他谈退休问题，才猛然想起自己已是花甲之年。退休以后，让个人支配的时间多了，他更是全力以赴。许多人退了休，除了锻炼身体，求乐、忙吃忙穿、照料儿孙，成了唯一的生活目的。戈隆阿弘的退休，只当是换了个工作室，越退休越忙。他有个想法，在史学界对彝族族源历史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彝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民族中有文化有真知灼见的彝人自己来写。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写成文章，发表在杂志刊物上，或编成集子和专著出版。而今，他已经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有2部学术专著，1本论文集，2部民间文学集，3部创作文学集，大都是在他退休以后出版的。他的彝族古史观、中国古史观，也显得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如：

《彝族“云贵高原土著说”的依据》，以众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如，云南是中国境内古人类发源地，是元谋人的故乡，古人类化石，从开远距今15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到三五万年的昆明人化石，虽有缺环待填补，但人类的繁衍一直未曾中断，而气候较严寒的氐羌生息的西北青藏高原，至今连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都没发现一处，证明人类迁入青藏地区，至今还不到1万年；彝族丧葬时送魂归宗的彝文经典，是研究彝族发源地的最具权威性的史料，目前从滇川黔桂4省彝区搜集到的18部丧葬时送魂归宗的《指路经》，其送魂终点，全都指向滇池周围的“纳特”，少数指向滇东北的昭通、东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氐羌后裔说”论据，不是误解古人，就是牵强附会，不足为信，阐明：彝族，包括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是地道的云贵高原的土著，所谓的“氐羌后裔”实际是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应正本清源。（此文首发于《红河文化》，2003年被中国人文科学与当代改革丛书编委会评为优秀社科理论一等奖，收入国家级大型文献《中国改革撷英》。）